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主编



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

回应革命与改革

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韩敏著

陆益龙

徐新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海外学子系列

刘东 主编

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

回应革命与改革

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

韩敏 著

陆益龙

徐新玉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韩敏著;陆益龙,
徐新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
(海外中国研究·海外学子系列/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4519-5

I. 回... II. ①韩...②陆...③徐... III. 乡村—社会
变迁—研究—安徽省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919 号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China-A Response
to Revolution and Reform

本书经日本版权所有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韩敏授权,委托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陆益龙先生、徐新玉女士根据原著日文版(韩敏: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
馆,2001 年)译出。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269

书 名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
著 者 韩 敏
译 者 陆益龙 徐新玉
责任编辑 花 蕾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19-5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韩敏 1993 年获得东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5 年开始历任东洋英和女学院大学讲师、副教授。2000 年至今在日本人类学最高研究机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任副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2 年 3 月至 2003 年 1 月，作为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作学术考察。研究方向：(1) 汉族的民族志研究。考察家族、女性角色、民间信仰等问题，是《生机的大地——中国风水思想及实践》(2000) 的编者之一。(2) 旅游人类学。在湖南、云南等地考察旅游现象的生成，是日本第一部旅游人类学教科书《观光人类学》(1996) 的执笔者之一。(3) 革命记忆的人类学研究。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主持了“中国的社会变化和再构筑——革命的实践和表象”课题组。

译者简介

陆益龙 1966年12月生。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安庆师范学院兼职教授。已出版《嵌入性适应模式——韩国华侨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流动产权的界定——水资源保护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中国历代家礼》(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等多部专著。翻译作品有《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5)。另发表论文40余篇。

徐新玉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现为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海外参展部项目经理。

出版人 刘健屏
策划编辑 府建明
责任编辑 花 蕾
装帧设计 阿 海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自序

本书是根据我 1993 年提交给东京大学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在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我自然想起中国人常说的老话:“吃水不忘打井人。”我从心里感谢在过去的 17 年里所有帮助过我和有关机构。

我在东京大学接受了人类学的基本训练,我的导师船曳建夫教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人类学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导师。在我的硕士和博士课程期间,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许多做学问的基本功。在此,我首先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我作田野调查和论文执笔的过程中,伊兹(Eades J.)教授、末成道男教授、伊藤亚人教授、关本照夫教授、山下晋司教授都曾给了我方法论的启示和真挚的批评。

我也非常感谢日本东京的“仙人会”,一个持续了 20 多年、拥有上百名会员的研究中国及其周边社会的人类学团体。在那里,我尤其是从植野弘子教授、横山广子教授、西泽治彦教授、聂莉莉教授、赖川昌久教授、清水纯教授、三尾裕子教授等学者那里,得到了许多诚恳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做学生期间,我感谢日本文部省和日本妇女协会学院(College of Women's Associations of Japan [CWAJ])为我提供的奖学金和研究基金。我尤其感谢我的日本朋友太田丰正先生和他的妻子太田美佐枝女士给予我的慷慨帮助。他们像父母一样关心我的生活,鼓励我的

学习。

在中国作田野调查时,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这些人包括:宿县地区县志办的周道斌先生,宿州学院李刚先生,萧县县委副书记杨厚民先生、李茂祥先生、徐金星先生,萧县妇联的各位干部以及乡、村的各位干部。我感谢李家楼的全体村民对我的接受和信赖。我尤其是感激我的房东李大爷和吴大娘,这两位饱经沧桑、善良忠厚的老人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让我真实地体会了一个皖北农家的喜怒哀乐。

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之际,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长野泰彦教授和黑田悦子教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本书的中译本的出版,有赖于北京大学的刘东教授、中山大学的麻国庆教授、静岡文化艺术大学孙江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刘建辉教授的支持和两位译者的辛勤努力。人民大学陆益龙博士翻译了1—4章,其余为徐新玉硕士所译。陆益龙通读了全部译稿,并作了重点校对和修改。最后,我对全书作了全面校对、润色和修改。谨在此对两位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家人——丈夫、父母、公婆、表妹、妹妹一家人,他们是我的理解者和支持者。尤其是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以后,他们不仅在中国为我照料两个女儿,我们的双方父母还忍受各种生活不便,多次来日帮助我料理家务。我也感谢我的两个年幼的女儿一帆和文佳。因为,她们忍受了从事人类学工作母亲的繁忙和与母亲分离的寂寞,她们对我精神上的支持,使我最终完成此书中译版的校对和修改。

韩 敏

2006年9月10日

于大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导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和国防现代化,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给了中国人一个更好地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如日本的比较中,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以及革命前的传统体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于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一场文化反思的思潮。

那时,我正在中国攻读日本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作为年轻的一代,我自然也受到了这场新思潮的影响。我内心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中国,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社会变迁与延续呢?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了人类学方面的书籍,那是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撰写的关于日本社会的研究。我被她的分析框架所深深地吸引,并且意识到,或许文化人类学这把钥匙能帮助我找到我的那些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答案。

我于 1986 年来到日本,在东京大学学习文化人类学。三年后的 1989 年 3 月,我完成了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的学习,撰写了关于匈牙利乡村社会变迁的硕士论文。我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中国和匈牙利两国在社会主义集体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找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特点。1989 年 4 月,我进入博士课程。这

年我在中国开始了田野调查工作。我之所以选择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农村作为我的田野工作地点,原因有二。首先,作为汉族的一员,我出生在东北并且在那里长大,历史上东北是汉人社会的边缘地区。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愿望,想研究一个在汉人社会的历史上一直是较为中心的地区。对我来说,中原是我的根基,这里是汉族祖先迁移和定居的地方,历经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以及文明的兴衰。其次,我的公公婆婆长期居住在位于中原南部的皖北的一个小城市里,他们那里的城市和乡村有着广泛的社会网络,这将有利于我的调查研究。

我于1989年10月开始了田野预备调查。在两个月内,我走访了安徽省宿州地区宿县和萧县的四个村子。最后,我选择了位于皖北萧县北部的李家楼村作为我田野工作的地点。为了尊重和保护被访问者的隐私权,我在处理县以下的地名(包括区、镇和村)时,都用了别名。书中出现的县级以上、19世纪以后的人物也都用了别名。确切地说,我于1990年2月在萧县李家楼村开始了正式的田野调查工作,到1991年4月结束。从1989年10月到1991年4月,这14个月的时间里我在李家楼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集中调查。后来,在1992年7月、1995年8月和2000年8月,我又三次回到李家楼作了短期的补充调查。本书所用的资料主要是在1989年10月到1991年4月间的田野调查中收集的。

一、主题概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对李家楼的影响;梳理在土地改革(1950年)、社会主义集体化以及去集体化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延续,并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20世纪,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发生了世界上最惊心动魄的革命。这场革命按照社会主义的理念,创立了一套崭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场革命动员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对于执政者来说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对于民众来说是一场宏大的

社会实践。那么,在这场革命中,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的情形是如何呢?本书试图通过记述一个有 600 年之久的宗族发展的轮廓,来揭示现代中国历史以及它对农村地区的影响。

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宗族和村庄的考察,来揭示社会结构及其机制的变化与延续。我之所以选择宗族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因为宗族研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中国汉人的研究史上宗族研究一直占主流。研究宗族并不是本书的目的,它实际上是笔者实现研究目的的一种手段。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中的宗族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结构,它不过是人们用来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和保障体系的一种媒介或策略。通过探究在过去 600 年里,特别是在最近 50 年里一个宗族的延续和变化,我将分析在中国现代史中农民是如何能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宗族研究对我以及本书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整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李家楼作为宗族村,已有大约 300 年的历史。在这 300 年间,李姓的近十代人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20 世纪初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乱世,也经历过多种自然灾害。1949 年以来,尽管发生了集体化和多次的政治运动,然而李家楼仍保持着李氏宗族村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制度。我们能从这种宗族的延续和小农状态的延续中得到什么启发呢?其中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多年以来,宗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保障的源泉和经营日常生活的结构。

(2) 宗族的延续为它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对宗族认同的基础。而这种对宗族的认同感正是导致生产责任制实施后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放宽而出现的传统实践和信念的复兴的因素之一。

(3) 宗族的存在影响着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通过建立新的行政机构,任命新的基层干部,不仅每个村,而且村里的每个人都被整合到中央集权的政府的框架中。那些身为当地宗族成员的地方干部,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他们既要保持着宗族或家庭成员的身份,履行他们在地方亲族网络中的义务,也要代表公社或集体履行一些职责。这使得这些基层干部与县、省、国家以及其他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复杂。如果我

们考察皖北村落建村以来的历史,那么就能看到村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关系本身就是由国家造成的。

二、中国农民研究的历史回顾

在阐释本书的意义之前,或许有必要将我的这一研究放到中国乡村研究的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去。对中国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始于 1920 年代,在这 80 多年的时间里,关于中国农村社区的研究虽然有广泛的积累,但中国的农村社区研究发展很不均衡,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国家特殊的历史造成的。

这里,笔者根据这种不均衡的因素,将中国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历史分成三个时期:革命前阶段、毛泽东时期、毛泽东之后时期。1949 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是人类学研究积累的黄金时期,因为在那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非常杰出的有关中国农村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在对中国不同地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统计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

如今,中国社会科学家将蔡元培于 1926 年发表的题为《论民族学》这篇文章已成为中国首篇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论文(Guldin1991:6)。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首次在学术刊物上用“民族学”一词来表示“ETHNOLOGY”,还对这一学科作了界定(王建民 1997:103)。蔡元培是从日语中了解人类学的。在 1920 年代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初期,“日本是早期人类学的各种理论——进化论思想、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最早的传播者。”(顾定国,2000:27)然而,1930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著作被大量翻译成中文,欧洲和美国的影响进而大大超过了日本(Guldin1991:6)。与此同时,西方人类学家,如布朗(A. R. Radcliffe-Brown)以及布莱克(Davison Black),开始在中国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或欧洲留学,并且在人类学方面得到了良好的训练。事实上,正是这些曾在欧洲和美国受过训练的学者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林耀华、李景汉和杨堃等人,

开创了中国人人类学研究的先河。他们的研究涉及婚姻与家庭、土地制度与农民生活、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和法律等。

费孝通,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在江苏和云南两地进行了社区研究。《江村经济》(1939)是对长江畔的苏南的开弦弓村的研究。书中涉及农民的家庭、亲属关系以及经济生活。《乡土中国》探讨了云南西部三个村庄的家庭经济、消费、土地所有制、人口流动以及工商业组织的情况。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到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影响。林耀华曾在哈佛大学师从于豪顿(E. A. Hooton)、克拉克洪(Kluckhohn)以及弗思(Raymond Firth),写了一本关于福建的一个村庄的半小说式的人类学报告,并以《金翼》(Lin 1947)为名出版。杨懋春(Martin C. Yang)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资助下,在他的家乡进行了田野调查。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被收录在《台头:一个中国的村庄》(Yang 1945)。本书主要关注家庭、血缘关系、宗教以及社区生活的其他方面。后来在《祖荫之下》(Hsu 1971)一书中,许烺光(Francis Hsu)指出了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之间在社会行为上的差异。他以这种差异为出发点,进一步对云南西镇的文化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富人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往往比穷人更倾向于坚守大家庭的社会观念。显然这说明了从整体上看富人的家户规模相对较大,而穷人的家户规模正好相反。除了上述这些报告以外,还有许多外国学者如布克(Buck 1937)、甘博(Gamble 1954)、施坚雅(Skinner 1964,1965)等,他们也对中国的农村经济和社会作了杰出的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中断。对本土的人类学者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人类学就遭到了怀疑。因为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及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相关联,所以遭到共产党的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其结果是,“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系于1949年11月合并到社会学系里,其他学校新创立的人类学系或专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Guldin 1991:8)后来,社会学也被批判为反动的、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学科,于1957年被撤销。从那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关于汉族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但在这一时期,在民族学的名义下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并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在这期间,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被中断,正如斯图尔德(J. H. Steward)所指出的那样,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来说,不幸的是,正当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趣达到重要阶段时,这个国家的研究资料受到了控制。(Fried 1953:11)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研究中国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来自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然而,仍然有很多作品采用了1949年前或更早的资料。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有关中国大陆(广东和福建)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华南的宗族组织》(1958)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1966)。虽然1949年以后关于中国大陆农村社区的研究1949年以前要少得多,但是这一时期仍有一些外国人类学家和其他观察家写的关于中国农村变革的报告。《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1959)和《初期的扬益公社》(1966)这两本书是克鲁克夫妇(David & Isobel Crook)在河南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那时,他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英语教师。他们报道了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这个村庄在形式上的很多变化。关于革命早期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大概要数韩丁(Hinton)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史》(1966)。在革命时期,他在中国做农业指导工作,二十年后他又重访中国并记录了这个村庄在这些年间的变化。在他的书中,他讲述了山西省的一个村庄如何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1948年到1951年间,杨庆堃(C. K. Yang)在广东省南景村开始了他的田野工作。他在《一个向共产主义早期过渡的中国村庄》(1959)一书中,描述了在共产主义的集权统治下村庄与更大的国家社区之间关系的变化。此外,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1959)一书中,他也分析了结婚和离婚形式的变迁;年龄和性别作为家庭地位和权威标准的改变;家庭功能的减弱,并对宗族的解体作了分析。在无法进入中国大陆作田野调查的情况下,一些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携手用族谱、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研究手法,对已有的汉人亲族研究的四个命题进行了挑战(Ebrey and Watson 1986)。

在毛泽东之后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开始重新恢复。尽管大多

数学者的著述仍然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学术著作的数量相对增加了很多。与此同时,学术协会和学术会议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曾一度被取消的人类学系也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得到恢复。至于汉族研究,学者们曾在 50 年代对它的起源展开过讨论,但是后来中断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汉族研究在中国开始受到注目,并被看作是民族学机构的主要任务(Lin 1991: 155)。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涌现出一些出色的由中国学者进行的有关汉族农民社会的研究,研究地区主要在福建(庄 1996;王 1997;潘 2002)、四川(萧 2000)、湖北(秦 2005)、安徽(Han 1993)、河北(麻 1999)、陕西(Liu 2000)、甘肃(Jing 1996)、辽宁(聂 1992)、黑龙江(Yan 1996)等地。这些学者均在 1980 年代以后,在美国、英国和日本接受了人类学训练,有些人至今仍活跃在海外。

国外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满足于香港和台湾的研究,以及根据难民所提供的信息所作关于大陆的报告(Parish and Whyte 1978;Chan, Masden and Unger, 1984)。不过,在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得以推广后,在海外学者中间又重新出现了在田野工作基础上所作的关于汉族乡村生活的完整描述,比如在广东(Siu 1989; Potter and Potter 1990)、福建(Huang 1989)、四川(Endicott 1988)、山东(中生 1990;Judd 1994)陕西(深尾·井口·栗原 2000)、云南(Bossen 2002)以及华北平原(路·佐佐木 1990)等地区所作的调查研究就属于这类。由佐佐木领头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民众运动的综合研究”是由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共同参与的,他们在 1988 年到 1990 年间,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进行共同调查。

总之,改革开放不仅给汉族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带来了生机,而且使中国的人类学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三、本书的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这是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安徽省的第一部民族志,也是关于皖北社区社会历史的第一篇人类学报告。仅有的关于安徽的三个主要研究是由人类学家傅瑞德(Fried 1953)、历史学家贝蒂(H. Bettie 1979)和哈扎尔顿(Hazelton 1986)进行的。这三个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49年以前安徽的状况,并且研究只限于安徽省的中部或南部。贝蒂对明清时期安徽桐城县的土地和宗族作了历史研究。她描述了一个组织更加松散,且纯粹以精英为核心的宗族。这些与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广东和福建的宗族类型不同。对安徽桐城县宗族的描述在人类学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伊沛霞(Ebrey)建议把与贝蒂所研究的相类似的宗族统称为“桐城型”(Ebrey 1983)。历史学家哈扎尔顿(Hazelton)也同样对明朝时期徽州休宁的宗族历史作了研究。而傅瑞德,他或许是在安徽进行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人类学者。他选择了靠近南京的安徽省滁县县城的一个社区,他的田野工作从1947年开始,到1948年结束,共计一年半的时间。他的研究是对滁县县城进行的一种社区研究。在他的《中国社会的构造——关于中国某县城的社会生活的研究》(Fried 1953)本书中,他对中国的家庭、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他提供了有关这一地区的历史资料。他是留在中国作研究的最后几位外国学者之一,并在共产党兵临城下之时才离开了那里。其次,他提出亲属关系虽然重要,但它并不能满足地主、商人、工匠、农民和工人等不同阶层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需求。他认为原因在于以政府的上层建筑的出现为标志的国民国家的发展在许多活动方面开始取代了亲属关系,甚至可能还与这种关系相冲突。因此,通过同以上三个研究的比较,可以看到本书是重要的,因为它描述了在帝政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以及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中安徽的一个宗族和一个村庄的变迁和延续,而1949年以来有关安徽的人类学研究一直是空白。

第二,本书深刻且直接地描述了家庭生产责任制推行的过程,以及它对家户、妇女地位、族亲及姻亲关系的重构等方面的社会影响。皖北是1970年代末在中国最先采取责任制的地方,家庭生产责任制

从这里逐步推向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1980年中共中央将这一管理形式合法化并正式在全国广泛推行。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方农民和干部迫使中央政府接受与当时已经确立的政策相反的做法。与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人类学报告相比,本书对这场至下而上的农村改革的过程及其影响作了翔实的描述,这是在当代的其他地区的人类学文献中很难看到的。

第三,本书对改革后的社会变迁与延续、妇女地位的变化、婚姻模式、血亲·姻亲·干亲关系以及基督教的迅速发展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和综合的分析。其中,社会变迁与延续以及妇女地位这两个主题是当前有关中国农村人类学著述中的热门话题;而婚姻模式、姻亲关系以及基督教在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则是在最近的其他著述中较少涉猎的主题。因此,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中国农村的人类学研究的贡献,而且也有助于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的理解。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本书是对皖北的李氏宗族和李家楼一个社区的历时性的研究,以14世纪明初作为时间起点。本书大致分成三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期、土改时期及毛泽东领导下的集体化时期、毛泽东之后的去集体化时期。笔者的这种时代划分,是以农民对土地权力,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变化而划分的。解放前,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两项权利都完全属于私人经济领域。因此,第一个时期是土地完全私有化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土地使用权虽然被农业合作社占有,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私人。而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这两项权利就都归属于集体。这种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一直持续到1980年前后。第二个时期是土地逐渐完全集体化的时期。1980年以来,土地使用权已经私人化,但是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集体所有。笔者把第三个时期称作去集体化时期。这些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的